

韩

愈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韩愈

● 洪祖斌 尹江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郭预衡,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4

(月亮文库/康琳,侯光复主编)

ISBN 7-80612-467-5

I. 中… II. ①郭… ②侯…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205 号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全 11 册)

郭预衡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3 插页 55
印数:0 001~8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刘青 宋丽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	陈正平 程萍
意设计中心	

ISBN7-80612-467-5/I·70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98.00 元(全 11 册)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主 编	郭预衡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任编辑	许文彦	
装帧设计	羽 人	
插图绘画	王国能	

《庄 周》卷 1	张文湫	选注
《司马迁》卷 2	黄 涛	选注
《韩 愈》卷 3	洪祖斌	选注
《柳宗元》卷 4	尹 江	选注
《欧阳修》卷 5	阿忠荣	选注
《曾 巩》卷 6	张廷银	选注
《王安石》卷 7	萧 放	选注
《苏 轼》卷 8	陶文鹏	选注
《归有光》卷 9	齐石宜	选注
《袁宏道》卷 10	李真瑜	选注
《集外卷》卷 11	田南池	选注
	赵伯陶	选注
	李 鸣	选注
	韦凤娟	选注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散文创作而闻名的大家不少。其中可称祖师者,有先秦的庄周、汉代的司马迁;可称大家者,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唐宋以后,可同大家比肩者,有明代的归有光;可与大家抗衡者,有晚明的袁宏道。其作品或汪洋恣肆,或生动传神,或逻辑严密,或文采横溢,均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家散文创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11卷11册,选编了这十位散文家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先秦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散文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散文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作品;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散文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散文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散文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篇文章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作品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该散文家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创作简表”和“散文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该散文家的其他选本或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散文作品大多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庄周、司马迁和王安石以外,每个散文家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篇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作家们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韩愈的生平与散文创作

韩愈(公元768—824年),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他是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是一位小官僚。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两句话道出了韩愈在中唐时代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唐时代特殊的气候与中国文化发展至此时的时代课题,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韩愈出生在中唐这一各种矛盾都十分尖锐与激烈的时代。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

(公元 768 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后的第五年。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可谓历经朝代转换，宦海沉浮。这一时期，藩镇势力尾大不掉，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移到江淮流域，依靠南方物力的支援，唐王朝还能勉强应付边患，平定藩镇的叛乱。在贞元、元和年间，唐王朝统治者还能保持外表的升平气象，但由于“均田制”的被破坏，连年战争，军费浩大，社会上一大批官僚、军士与僧侣靠着百姓的赋税养活，再加上统治者的奢靡无度，致使百姓处于困苦不堪的地步。同时，皇帝信任宦官，腐朽势力控制着朝政，正直官员的谏诤往往受到压制与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恢复儒学的权威，巩固皇权，确立正道，以振兴大唐帝国，就成为一批有志匡世的知识分子进身入世的忧患情结。韩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的。危机四伏的时代，动荡不安的局势，文化建设面临的课题，造就了韩愈这样的文化伟人。

韩愈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潜心就学时期；初入仕途时期；宦海升浮时期（其中又分前期与后期）。他的散文创作紧密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入仕之道，辅时及物，载道立言，体物缘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点。因此，要了解韩愈的散文创作，就必须考察他的生平事迹。

潜心就读时期 这一时期，从代宗大历

三年(768年)出生到德宗贞元七年(791年)韩愈二十四岁那年。这一时期是韩愈潜心就学,培养人生观与文学观的时期,为他以后的从政与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韩愈从小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在十一岁之前,他一直跟随为官的兄长韩会生活。大历十二年,韩会因事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到任所生活。后又经历了几次迁播,全靠兄嫂的照顾。这种孤苦的生活,使他能够珍惜时光,发愤读书,养成了独立自强的个性。韩愈七岁就开始遍读经史子籍,饱览众书,十三岁已能属文。他曾追随当时的古文名家独孤及、梁肃等人学习古文,潜心钻研五经及诸子百家之学,锐意进取,留心于古今成亡兴败之事。他曾自叙:“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可见这时韩愈已经培养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了。

初入仕途时期 这一时期,从贞元八年韩愈(792年)中进士到贞元十八年(802年)三十五岁。是韩愈初入仕途,磨励志向的时期。也是他散文创作的旺盛时期。在封建社会之中,像韩愈这样的有志士人,必须经过学而优则仕的准备阶段,尤其是隋唐时代确立了士人入仕必须经过科举考试的道路。韩愈也不例外,这种道路既促成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沉浮与国家命运、皇帝恩宠相联系的人生观,同时也造成了他性格中过分追求功名利禄的一面。要了解韩愈性格的这种躁竞与

鄙俗的一面，就不能脱离唐代知识分子的这种人生道路与时代背景。在经过多年的苦读之后，韩愈在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开始应举求官，离家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但结果并不理想。三次考试都名落孙山，直到贞元八年（792年）参加第四次进士科考试，才终于考中。然而在吏部主持的考试即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中，韩愈却屡试屡蹶。于是，在百般无奈之下，韩愈开始奔走于权门之中，他三次上书当时的宰相，要求仕进，但全无结果。在京期间，他怀着郁闷的心情，写了《上宰相书》、《上贾滑州书》、《明永赋》等应酬文章，也写了《答侯继书》、《答崔立之书》、《应科举目时与人书》等散文。这些文章抒发了他有志进取、与友人互勉的志向。贞元十一年五月，韩愈在无奈之中，离京东归，途中经过黄河风陵渡时，有感于当时地方官以珍禽进献皇帝邀宠。而自己却仕途蹭蹬的遭遇，写下了著名的《感二鸟赋》，以抒发内心的不平。九月，他到达东都洛阳，过田横墓，追怀田横义高而得士的壮烈举动，作《祭田横文》。贞元十二年（796年），韩愈二十九岁，开始步入仕途。先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观察推官。贞元十七年，又奉调回京师，翌年，在国子监任四门博士。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下了不少的散文与诗歌作品。有《答李翊书》、《上张仆射书》、《答孟郊》、《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

序》、《师说》、《与崔群书》等。这些作品,真实地抒发了韩愈初入仕途遇到的种种困惑、苦闷、彷徨与愤慨的心情,并且融入了他对社会人生与文学现象的思考,是韩愈散文中的精品。

宦海沉浮时期 这一时期从贞元十九年(803年)至穆宗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于长安。是韩愈宦海沉浮,创作日趋成熟的时期。其中又分前期与后期。前期从贞元十九年至宪宗元和十年(816年)韩愈四十七岁这一段时期;后期则从元和十年至韩愈病逝。贞元十九年,韩愈升任监察御使。这一年关中旱,韩愈向皇帝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反对官吏横征暴敛,请求朝廷宽免徭役,结果惹怒了皇帝,被贬官到广西阳山县令,这是韩愈第一次受到贬黜。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韩愈被召回朝廷,任国子博士。其后几次升迁,任过河南令,职方员外郎等职。这一段时间韩愈的重要散文作品与诗歌作品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南山诗》、《石鼓歌》、《秋怀诗十一首》等。

元和十二年(817年),韩愈因从裴度参加平定藩镇吴元济的“淮西之役”而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在平淮期间,他写了著名的《平淮西碑》,记叙了平定淮西叛军的过程,也因此而引起了一场风波。应该说,这一段日子韩愈是很有作为,也是官场得意的。但韩愈

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会也不懂得因位高而采取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自凤翔迎佛骨至京师，自王公贵族至一般僧尼信徒，欢喜欲狂，奔走相告，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盛况。韩愈对此十分反感，他认为佛教的兴盛不仅冲激了儒学，而且耗费了大量的国财与税收，足以动摇国本，应该加以抑制。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上书宪宗，反对迎佛骨，写下了著名的《论佛骨表》。书上，果然触怒了宪宗，欲以死罪论处，幸亏裴度与崔立等人的援救，才从轻发落，被贬官潮州，任潮州刺史。在任职期间，韩愈虽然心境十分愁苦，但他还是出于儒家的仁政思想，关心民生疾苦，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民俗改革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在袁州时，曾废除了男女奴隶典身的民间陋习（事见《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

元和十五年，宪宗死去，唐穆宗即位，韩愈被召回长安，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被转任兵部侍郎，这时镇州兵乱，杀死节度使田经正，立王廷凑。唐王朝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率军讨伐，然而出师不利，牛元翼的军队反而被王廷凑所包围。次年二月，朝廷派韩愈前往镇州招安王廷凑军，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地疾驰入王廷凑的军营所在地镇州。王廷凑得知消息后严阵相待，列兵帐下，欲以武力威摄之。韩愈无所畏惧，严辞挫败叛军的气焰，以利害关系打动王廷凑及其

部下，使之归服朝廷，韩愈也因此为唐王朝立下了功劳。旋被任命为吏部侍郎，故后人称其为韩吏部。长庆三年，韩愈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他严格治理下，首都的治安状况大有改观，“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涨）”。后因与御史中丞李绅不和，被罢为兵部侍郎。不久又被任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得病，十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死后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又被后世称为韩文公。这一段时间韩愈所写的主要散文作品有《南阳范绍述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等。韩愈在这一段时期内虽然任职显要，但他并没有产生贪禄保位的想法，而是积极进取，如力主并参加了平定淮西叛军的战役，冒死谏迎佛骨，虽被贬潮州，也不忘为民除弊兴利，冒险前往镇州宣慰王廷凑归顺，任长安京兆尹时治绩卓著等，说明这一段时间正是他为唐王朝效忠的时期，也是实践他平生所信奉的儒学济世之志的时期。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韩愈散文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文道合一、政教色彩浓厚了。

二

作为一代文化伟人，韩愈一生的主要成就就在于他领导了当时的古文运动，并且在散文创作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以其关于古文运动的理论与杰出的创作实践，改变了

六朝以来的骈骊文风，开创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崭新时代。当然，从文学史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古文运动在中唐时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各种社会环境与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古代的散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章体采用了散句单行的形式。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是用的这种文体，秦汉时代的著名散文家如贾谊、晁错、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文章沿用了这种文体，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自汉末以来，儒学衰微，中国古代的文章写作受当时文学自觉潮流的影响，主动追求骈骊对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骈体文。应该说，在骈文发展的初期，它具有抒情性与华美性的一面，也并不影响内容的表达，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骈文作品（详见姜书阁《骈文史论》），《文心雕龙》这部提倡宗经、征圣、原道文学观念的文学理论名著本身就是用骈文写成的。但到了六朝后期，随着士族审美趣味的华靡空虚，于是骈体文日益走向形式主义，出现了文胜于质的偏向。更重要的是，从帝王到文人沉迷于追逐文章形式的华靡，势必削弱了对儒家道统的信奉，以及儒学的地位。因而西魏以来，就有一些受儒学影响的文人重倡儒学，要求文体的改革，以文体的复古带动儒学的复兴，进而重振皇纲。例如西魏苏绰曾仿《尚书》的文体作《大诰》，但是过于摹古，不合时流，宣告失

败。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的华艳,甚至拿个别文表过于华艳的地方官问罪,文臣李谔上书请革文风。但是这些做法,一则过于简单,二则这些倡导者并没有成功的古文创作范例,而是单纯寄希望于行政措施,故而收效并不大。初唐时期,从帝王到文臣,写作时仍然嗜爱骈文,文风华丽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天宝以来,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在文学领域大力倡举复古主义思潮,先后写出了成功的散文作品,成为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的先河。

韩愈的古文理论及其散文创作出现在中唐时代,又和“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刺激直接有关。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一蹶不振,藩镇割据的势力并未消除,佛道二教势力很大,它们靡耗国家大量财富,而且也与唐王朝的统治发生矛盾。但是贞元二十年间的相对安宁的日子,毕竟给唐王朝带来了暂时的升平气象。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复兴思潮,正是适应了统治者重振朝纲,加强和巩固大一统专制帝国势力的需要应运而生。为此韩愈不遗余力地宣传与弘扬儒学,抗颜而为天下师,培养了一批弟子,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声势,韩愈大声疾呼的儒家之道,既有维护封建法权与专制制度的一面,同时也有维护国家统一,施行仁政的一面;也包含着尊崇封建纲常,宣传封建道德成分在内。他继承了荀子、扬雄、刘勰以来宗经、征圣、原

道的文学观念，认为文道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合一的。文以载道，文以明经，因此，学习古文，根本的目的就是由道及文。他明确提出：“愈之为古文者，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辞后》）。为此他极力号召他的弟子为文首先要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这些古文不但指圣人的经书，而且还包括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古文。当然，韩愈所主张的学古不是指摹仿，而是指有所继承与创新，即“师其辞，不师其意”（《答刘正夫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有一定的创新，“惟古于词必已出”（《答李翊书》）。

韩愈是一位文学家，当他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他倡举的“道”往往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去立言倡论的。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他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继承了从孔子“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愤著书”，以及六朝时钟嵘、刘勰等人的“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突破了他的道统之说。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人的善鸣，同时也肯定杨、墨、老、庄等人的善鸣，这样，他的文学创作论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为“不平则鸣”的现实依据。所谓古文，就不仅仅是传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写现实的工具。从

韩愈散文的创作成就来看，他的最好的文章不是宣讲道义的作品，而是对自己与周围那些坎坷不幸人物命运的写照与对黑暗现实的抨击。他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古人语言，也是和他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分不开的。

韩愈在古文理论上宣传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点。他以道为古文创作的最高范畴，学道则必然及于古文，因为圣人是用文来载道。这一观点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在西汉扬雄的《法言》与齐梁时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都已经说过，但韩愈与他们相比，更突出了古文写作的现实性与创新性，他十分强调“唯古于词必已出”，“唯陈言之务去”，他认为古文写作首先必须纲举目张，进行道德上的修养。为此他提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因此，文章写作归根结底是内在修养的显示，就像孟子说的“充实之谓美”。韩愈强调：“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而这些道德修养与文学创作又离不开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的生活感受是古文创作的根本源泉。尽管韩愈十分注重宗经征圣原道，但他与扬雄、刘勰相比，始终将作家的现实人生放在写作的第一位上。这是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与中唐时代的特殊背景有关的。在《送孟东野序》中他大力宣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